

# 引 言

## 一、地理知识与地理学——研究范围

地理知识是人类对周围环境的认识 包括地理名称、地理数据、地域分布、地理景观等各种地理事实的材料。地理知识是与人类的‘空间知觉’同时产生的，<sup>①</sup>随着文字的出现，地理知识形成了地理文献，地理文献的积累和增长，形成了最初的地理学。地理学是在地理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条理化的结果，如地理规律、地理成因等的推理和概括。地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领域，它所研究的地理环境，是地球表面自然、技术、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综合系统。在地理学史的研究上，研究者考察地理知识和地理学的进展，往往从地理发现、地理文献、地理学思想三者入手，本文有关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是以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的形成和流传为中心，以东传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与思想为线索。

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不同地域居住的不同民族 形成了他们各自对周围世界的不同看法。古代中国和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不同的地理认识。古代西方的地理学曾被视为“科学之母”因为在古代科学分化不明显的时期，它是一个包罗广泛的领域。近代科学的发展，使许多同地理学相邻的学

科如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相继独立,17到19世纪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经济学的进步又为近代地理学向一门科学迈进提供了重要的前提。16世纪的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也产生了飞跃的进步。地理知识与欧洲资本主义海外贸易和航海事业是同步前进的。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出现了绘有美洲和南极大陆的新的世界地图,西方有关地球形状、海陆分布、气候差异以及各国地理情况的认识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新的地理认识通过文献的形式将所总结事实上升为理论与体系,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和学派。16世纪末西方耶稣会士在地理大发现这一背景下从欧洲来到中国,为中国人带来了地理大发现后形成的地理学汉文西书。<sup>②</sup>虽然本书是以1815至1911年引进的西方地理学译著为考察的中心,但从文化输入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利用学术界先行研究成果,简要地论述一下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方地理学知识点。

在近代科学中,地理学是一门内容庞杂的学科,直至19世纪形成的近代地理学才逐渐摆脱古代地理学半科学、半文学的状态开始吸收近代科学的成果形成了自己学科的一套范式和工作模式。以洪堡和李特尔为代表对地球表面各种现象进行条理化描述,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性解释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同一时期,西方地理学的知识线在19世纪初通过作为主译者的新教传教士再度东传,特别是20世纪初的十余年间,由于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地理学译者群体的出现,以及大量民营出版机构介入地理学译著的出版发行使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是从传播内容与规模、传播方式与渠道上还是影响的范围和深度上都

大大超过了明末清初，为近代中国引进了一整套西方地理学知识体系和专业术语，初步建立了能提供在概念与方法上进行传授的地理学教育体系，形成了非体制化和体制化的地理学共同体的交流网络，经过与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碰撞与交融，使中国地理学在晚清发生了传统到近代的学术转型。

## 二、边缘史的清晰度——资料与先行研究

本书所作的这一研究属于中国近代地理学史的范围，然而由于着眼点在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因此又走到了中外地理学交流史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边缘。作为一项文化边缘史的研究，本书所依据的资料与先行成果相当驳杂与广泛，涉及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史、中外地理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文献学等范围，这里笔者只能就相关的前行成果，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举要叙述。

最早注意西方地理学译著的是清末学者王锡祺，1877至1897年他分三次编成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选录了部分清代国内外译者译述的各种地学书籍。1894年同康庐辑印了130卷《中外地舆图说集成》其中收入外国的地学图说多种。20世纪初的几本西学目录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如1896年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列出了若干西方地志方面的译著并在后附《读西学书法》一文中评价了当时出版的部分地理学译著。1899年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的卷3“地学”和1904年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卷5“地理学”分别著录了多种地学译著。

较早对中外地理学交流史进行系统研究的是1911年陶

懋立的《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一文。<sup>③</sup>该文把中国地图学史分为三期：一为上古至唐的中国地图之时代，二为宋元至明阿拉伯地理学传入之时代，三为明末至清末欧洲地理学传入之时代，指出这一时代受西方地理学影响而完成的诸家地理学图书“皆前古所未有者”。同年陈学熙的《中国地理学家派》也是颇值得重视的一文<sup>④</sup>，该文把 19 世纪中叶前的中国地理学家分为“禹贡派”、“山海派”两家，指出“山海派”中的“瀛环家”即清末普通教育中之“外国地理学家”如明代利玛窦、艾儒略，清代南怀仁，“游说于士大夫之门，而我国学子始谈瀛环地理。”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接踵而至，日益昌盛”。该文还把清末的地理学者分为游记家（王锡祺）、新化家（邹代钧）、中国地理学家（龚柴、张相文、屠寄、马晋羲）、外国地理家（龚柴、谢洪赉）、自然家（沈仪熔、奚若、叶瀚、张相文）五家，认为即使在世界地理发明方面，中国也是最早最盛的。

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从学术史的角度研讨了明末以来西方地理学译著东传与清代学术的关系，1923 至 1925 年他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一章中指出了“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明末清初的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和蒋友仁，以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又先后成书，使中国士大夫开始有了世界地理知识，并指出邹代钧‘自制中国舆地尺’以‘绘世界全图’”，大大促进了清代制图学的进步。<sup>⑤</sup>徐家汇圣教杂志社 1926 年出版的徐宗泽《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分六部分介绍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对舆地学、天文学、数学、炮术、神哲学传入中国初期的贡献和经过情况，以及明清两代朝廷对西

学的态度。

30年代应当提及的几部通论性著作有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和《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4年),两书均有专章论述“明清之际之耶稣会士与西学的关系”后者还讨论了鸦片战争之后西学的输入。向达指出“西洋的地理学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对于空间上得一新观念”。<sup>⑥</sup>张星烺不仅编著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六册史料集还撰写了《欧化东渐史》分三章简要地论述汉代至清末二千余年欧洲文化东渐的途径、媒介、西方物质文明(科技)和思想文明(宗教、伦理、学术等)的东传。由于受体例和资料的局限,上述这些著述对西方地理学东传的研究显得比较简略。这一时期在中外地理学交流史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有关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1936年的《禹贡》第5卷第3、4合期上刊出了“利玛窦世界地图专号”其中有洪业的《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和陈观胜《利玛窦对于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二文对世界地图的中国藏本作了系统的分析至今仍是研讨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典范之作。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在1936年先后发表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载《地球》第26卷第4号)、《月令广义 所载之 山海輿地全图 及其系统》(载《地理学》第12卷第10号)澄清了《两仪玄览图》的刊刻者是李应试,补正了洪业一文之缺。<sup>⑦</sup>1938年德国卫礼贤以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藏本为主加上世界各地的抄本完成了意大利文版的《利玛窦 坤輿万国全图》(梵蒂冈教廷图书馆1938年版)该书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全部采入并著录了中国、日本、伦敦、巴黎所藏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照片。<sup>⑧</sup>

1938年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收入了王庸的

《中国地理学史》该书分原始地理图志及其流变、地图史、地志史、近代地理学之进步四章。该书认为：“除掉地图和西方科学输入以后的地学之外，在中国学术史上实在是很少可以称为地理学的。”<sup>⑨</sup>该书是一部以地理图籍为中心的地理学史，其中地图史一章中“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影响”一节基本上依据洪业、陈观胜两文编写的。该书作为第一部中国地理学史，在对清代西学测绘地图学及其影响的论述方面，在有关近代地理学的研讨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来的中国地理学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基础和线索。该书 1955 年又再版，表明历经 18 年，有关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以后作者又据该书中有关地图的两章加以扩充，经顾颉刚等人整理成《中国地图史纲》一书，1958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专门讨论了纬度测量和利玛窦世界地图、第一次中国地图的测绘和近代中国地图的测绘。30 年代周昌寿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一文首次对清末地理学译著进行了统计，指出从 1872 至 1911 年的 39 年间出版的地理学译著（包括地质、地文和测绘）共 58 种，<sup>⑩</sup>平均每年 1.5 种。这一统计，在 80 年代乃至最新的一些博士论文仍在沿用。<sup>⑪</sup>

40 年代方豪推出了《中外文化交通史》（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3 年）就明末七千部西书流入中国、明清间译著的底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53 年开始，他陆续推出《中西交通史》，其中第 4 篇集中讨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1954 年由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印行。其中第 4 篇第 6、7 两章专门讨论地理学，第 6 章全面、系统地分析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影响与贡献，艾儒略《职方外纪》与《西方答问》中地理问题，徐霞客与西洋传教士的关系，第 7 章论述了南怀仁的《坤舆图

说》与《坤輿外纪》、康熙时西方传教士的测绘工作和测绘方法、蒋友仁的《坤輿全图》及传入的地动学说 并研讨了明清学人对西方地理学的反应。作者擅长从浩如烟海的中外文献中爬梳原始资料 取材广泛、考证缜密 在研究上大大超过了前人。可惜由于两岸的学术交流长期隔绝，直至 1987 年岳麓书社重印后，该书才在大陆学术界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1962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在讨论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在水利事业的应用和制图学方面，未能充分地利用方豪的研究成果。

80 年代以来，随着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兴起，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也愈来愈受到学界的重视。1984 年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和金应春、丘富科的《中国地图史话》 涉及了明清直至近代的测量与制图、边疆和域外地理的考察等内容，为明清时期的中西地理学交流史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同年测绘出版社推出了卢志良的《中国地图学史》 该书用专章分析了明末西洋制图学的输入与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1986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谭其骧主编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 其中第 1 部分“通论”收入了清代学者为一些明末以来的若干西方地理学译著所写的序跋 第 8 部分“外纪和边防”中选收了不少清代地理学者有关俄罗斯、安南和欧洲等国的考释 以及有关西方地理学译著的序跋，为学者查阅清人地理学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一书 鉴于当时出版的中国地理学史大多只论述古代 而对近代部分则付阙如的不足 该书用了 50 多页的篇幅 研讨了 1894 至 1949 年西方地理学东传和近代地理教育措施及研究机构

的设置，但主要用力处是在 20 世纪初民国时期的地理学。1989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杨吾扬的《地理学思想简史》，把中国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作为整个世界地理学思想演变的一部分来考察。该书第 5 章为“中国近代和现代地理学思想”，考察了鸦片战争之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可惜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仅仅论述了西方探险家对中国的考察，未能述及西方地理学译著东传的史实。<sup>⑩</sup>1990 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也注意从整个世界地理学思想演变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其中也有若干篇幅涉及晚清西方地理学的东传及其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1990 年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有于希贤编著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该书在“中古时代晚期的地理学及近代地理学萌芽”一章中，利用新近国内的研究成果对其师侯仁之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作了续编。80 年代西方学者中较有影响的研究有美国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明清时期的地理学研究》（载 *MONUMENTA SERICAL* 35, 1981—1983）。总的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虽对西方地理学输入有所论述，但大都集中在明末清初，有关晚清的内容多语焉不详。

90 年代晚清西方地理学东传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1994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对晚清西学史作了总体考察，其中也采撷了不少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的第一手资料。同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杨文衡主编的《世界地理学史》。该书在论述近代地理学方面也简要地述及了中国对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引进和吸收。1996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张岂之主编的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该书第三编第六章“近代地理学学术史研究概论”分三节讨论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历史渊源与国势背景、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特点、中国传统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的过渡等等。有关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的全面调查工作是由艾素珍作出的。她在《清末自然地理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清末人文地理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两文中,<sup>③</sup>分别对 19 世纪 70 年代至 1911 年的 80 多种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译著作了分类和部分的提要,并简要地分析了它们的特点及其影响。在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史的研究方面,还特别应该提到郭双林的工作。他在《原学》第 1 辑《学人》第 7 辑和第 9 辑上分别发表了《迈出传统的门槛》、《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述论》和《晚清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的际遇》等文,1998 年第 4 期的《清史研究》还刊出了他的《从地理学著作的编撰看晚清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就晚清西方地理学的东传及其影响作了若干较为深入的剖析,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1998 年 12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荣、杨正泰著《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全书分上下两篇,其中也有相当篇幅论及清代后期中西地理学的交流。1997 年 10 月,日本白帝社出版有荒川清秀的《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一书,该书首次以地理学为中心对明清以来的地理学学术用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察。

### 三、知识传播与思想变革 ——方法及其意义

正是在上述学界先行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笔者近两年

来对 1815 至 1911 年的西方地理学译著所做的较为系统的统计分析为基础，除了这一时代的西方地理学译著和中国人的地理学著述外，笔者还尽可能发掘和利用包括文集、笔记、日记在内的各种文献资料，旨在更清晰地表现出近百年间西方地理学译著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哪些新的知识点，增加了哪些新的知识量，其所输入的知识线和知识体系对中国人知识结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有哪些重要的影响；西方地理学译著引入的新知识体系和专业术语，在晚清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和扩散中产生了何种学术影响和社会效应，西方地理学的传播，给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变提供了什么样的知识背景。笔者希望通过这一研究，给出一条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基本线索，提供一个较之前人更为全面和更为清晰的历史画面。本文着力点在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所以在方法上较多地借助了历史文献学、文化传播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注意考察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所涵盖的知识容量、译著载体的变动与知识传播的关系、传播者与接受者相互依存的关系，西方地理学在晚清中国社会传播和扩散中产生的文化互动现象，西方地理学新知识体系和范式传播所带来的学术影响。本文力求做到的是：把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建立在坚实的资料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之上。

研究晚清西方地理学的知识传播，自然也把这一课题归入了思想史研究的范畴。地理知识与地理思想有区别也有联系，地理知识是同种地理信息的汇聚，是对一组地理事实的条理化的描述，它表示一个推断的或经验的结果。地理知识的初级形态是经验性空间知觉，高级形态是理论性空间知觉。高级形态的地理知识就是地理意识，是人对外部

自然与人文世界的经验、体验、理解和感知，即包含着人们对地球与人类、自然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深刻认识，就是通常所说的地理思想。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知识是一种特殊的信念或意见，是精神的一种特殊状态。”笔者所说的地理知识即这一层意思，它是指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它见诸于物质载体的、不与个体共存亡的客观知识。它由人们的理论、推测、猜想的逻辑内容的各种信息积聚而成。即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sup>⑭</sup>没有经验性的地理知识，地理思想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而没有上升为理论性的地理思想，经验性的地理知识便无从建立起自己的秩序。葛兆光认为：“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sup>⑮</sup>我以为西方地理学在晚清的知识传播史，研究的正是西方地理学知识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传递、变化与增长，晚清思想演变史也需要考察西学知识传播如何刺激和催发思想的变革，提供思想变革的新知识背景和新思想确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作为西方地理信息积聚的知识，它有一种很重要的属性，即可扩充性、可传输性和可扩散性。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扩散，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地理学发展的“加速度现象”，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知识结构下形成的以华夏为“天下”、“惟中国有文明的”虚幻环境”。<sup>⑯</sup>

知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有着自己特殊的网络与系统，本文在对晚清西方地理学知识传播和近代中国人思想变革的分析中，借助了地理学中常常使用的点状、线状和面状的方法，来解说知识与知识结构的变动。

(A) 知识点。即知识的基本单元，是人们通过观察获得

的事实描述。知识点的增加，与传统知识点形成碰撞，从而升级与质变，导致知识量的不断增长。晚清西方地理学新知识点表现为地理学知识的专业术语、译作等等。

(B) 知识线。即知识系列，它由若干起重要维系作用的知识点所组成，这种形式能够记录、控制和理解各种新知识点。它有关联性和延伸性的特征，正是因为它的不断扩大和增长，形成了新的知识线，构成了一个时期一门学科知识存在与运动的方式。如 19 世纪西方地理学输入后形成了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地球与地文学、气象与气候学、区域地志等知识线 20 世纪初又出现了文化与政治地理学、交通与旅游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商业地理学等新的知识线。

(C) 知识面。即知识体系 是知识的理论系统 它由纵横交错的知识点与知识线所构成。通过内在网络式的交流、交换与交叉组合，形成运动的知识板块，晚清传入中国的西方地理学就是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知识世界，也是近代中国人知识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基础。

(D) 知识量。即知识的度量尺度。它由知识的各个层面 即知识点、知识线、知识面的知识含量、知识比率增长的量化表示。正是由于晚清西方地理学输入的新知识点的不断增加和裂变，知识线的不断延长和扩大，知识面的不断交换与重组，出现了本文拟要阐述的近代中国地理学发展中的“加速度现象”，从而导致了清末地理学从传统到近代的学术转型和近代地理学“范式”确立。

本书是通过六章、四个附录来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组织。从事西学东渐的研究，必定要追本溯源到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的引进，同样要上溯到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

所引入的新知识点 只有这样 才能对晚清输入西方地理学的内容作出准确的估计。本书第一章考察了明末清初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耶稣会士通过汉文西书引进的西方地理学新知识点。论证了明末清初的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仅仅局限在很小的学者圈子里，远远没有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地理常识。明末清初中国人的外国地理著述，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未能充分认识到地理学汉文西书的意义及其价值，几乎没有学者能对耶稣会士所介绍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作进一步的和深一层的学术研究 从总体上来说 没有能对西方地理学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应战。

第二、三两章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 以译著为中心 以戊戌变法为界标 分别对 1815 至 1911 年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比较完整的全景式的描述。第二章按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以及编译的杂志和书籍为重点，论证了戊戌变法前新教传教士作为主译者绘制的地理学知识线，及其这些译著所形成的中国“地理大发现”对于中国士大夫建立“地理台阶”并在此基础上从技术科学到心理认知，一步一步理解西方文化的意义。第三章是以留学生群体和翻译出版机构为中心，考察了戊戌到辛亥近代西方地理学思想与知识体系的输入。

晚清西方地理学的传播，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哪些新的知识点 增加了哪些新的知识量 其所输入的知识线和知识体系对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有哪些重要的影响。本书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建立在地理学文献中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地理学教育与近代地理学教科书的编纂、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这三个基点上。这分别便是本书第四、第五、

第六章的内容，而这三方面的研究，只有很少的相关的先行成果可以凭借。因此在地理学新词和地理学教科书的资料调研方面，做得极为艰苦。本书第四章对晚清自然地理学专业新词汇的研究，第五章关于清末地理学教育与近代地理学教科书编纂的研究，虽然还只是作了最浅层的分析，但使西学东渐研究中最难把握的影响分析，建立在了实证的基础上。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导致了中国产生了传统到近代的学术转型。90年代以来学术转型问题，成了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而相关的研究大多从剖析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个案为基点，本书第六章首次提出了非体制化和体制化的“地理学共同体”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分析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转型，从而为阐述中国近代学术传统的变革，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附录一、附录二提供了本书研究的一个资料基础，也是进入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史料索引。附录三是据附录一、附录二绘制的出版年代的分类统计表，附录四是便于读者对本书所引文献进行核查的文献目录。

注释：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人类的空间知觉不是一种感性的材料，它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包含着所有不同类型的感官经验的成分——视觉的、触觉的、听觉的以及动觉的成分在内。人类正是靠着这一非常复杂的思维过程，才获得了这种抽象空间的观念，使人类开辟了通向新的知识领域的道路，开辟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全新的方向。参见《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页55—56。

“汉文西书”的概念主要用于明末清初，指西方传教士用汉语撰写，或在中国人帮助下编译的有关西方内容的各类图书，包括有原本参照的译著；或无原本依据，只是西方传教士依据西方概念和内容编写的各种图书。晚清的西学图书，绝大部分有可参据的原本，因此使用“译著”这一概念。

载《地学杂志》第 2 年第 11 号(1911 年 2 月 18 日)第 2 年第 13 号(1911 年 4 月 18 日)

载《地学杂志》第 2 年第 17 号(1911 年 10 月 11 日)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页 467—468。

- ⑥ 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页 96.
- ⑦ 见《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 1981 年 页 221.
- ⑧ 参见方豪《梵蒂冈出版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 读后记》载《方豪六十自订稿》台湾学生书局 1969 年 页 1898—1901.
- ⑨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8 年 页 1。
- ⑩ 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页 434。
- ⑪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的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一书(页 247)沿用这一统计 1998 年 12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荣、杨正泰著《中国地理学史 清代》一书(页 8)也仍在沿用这一统计，该书是以赵荣的人文地理学博士论文为基础完成的。
- ⑫ 1995 年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赵荣《地理学思想史纲》一书也有一些篇幅述及西方地理学的东传与清初的地理学新思想，较其师杨吾扬一书中的相关章节有了更进一步地提高。
- ⑬ 两文载《中国科技史料》第 16 卷(1995 年 第 3 期、第 17 卷(1996 年) 第 1 期。
- ⑭ “世界 3”是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把客观的物理世界称为“世界 1”把主观经验的世界称为“世界 2”把书籍、

计算机存储器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称为第三世界客体，即“世界 3”。他强调“世界 2”的主观知识都依赖于“世界 3”，以往的知识论没有认识到这一重要的问题，忽视了客观意义上知识的存在。参见 [英] 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页 78—79。

- ⑮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页 29。
- ⑯ “虚幻环境”（pseudo-environment）一词是 W.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在《舆论学》（Public Opinion,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 Inc. New York, U. S. A. ,1965）一书中提出的，指人们以符号为媒介在头脑中虚构的行为环境，是与现实环境即地理环境相对照的象征性环境。林珊将此词译为“假环境”。参见《舆论学》华夏出版社 1989 年，页 9—10。

## 第一章 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与 新知识点的引入

### 一、明末清初东传的主要地理学汉文西书

中国有着悠久的地理研究的传统，在明末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之前，也已有了自己对“海外诸国”的认识。这些认识主要来源于所谓“海客谈瀛洲”的从事中外贸易的商贩和水手以及部分“蕃图”。宋代以来，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出现了第一部较全面地反映世界地理的著作《诸蕃志》。该书由在福建提举福建路市舶司任市舶提举的赵汝适所著。作者根据自己所“阅诸蕃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芟其秽渫，存其事实”，<sup>①</sup>写成两卷。上卷“志国”言诸国概况，所记国家 58 个，东至今日本、菲律宾，南止印度尼西亚各群岛，西达非洲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北至中亚及小亚细亚。下卷“志物”言物产，记载物产 47 种，另附记海南岛的地理与货物。明代张燮仿《诸蕃志》体例撰成《东西洋考》12 卷，记述了西洋 15 国、东洋 7 国，另附日本和荷兰。郑和七次下西洋，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进一步得到了拓展。出现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蕃国志》详细地记述了 30 多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和地理